

在文明探源中探寻“何以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编者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与普及？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学术家园：从您2000年发表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构想，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启动预备性研究、2004年正式启动，您始终走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怎样的重大问题？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开展20余年，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这一工程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即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国外学术界曾普遍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据是《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理事会作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

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我们之前还曾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具，存在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使用文字而是结绳记事。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总结出新的“三要素”——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三要素”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也符合其他地区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学术家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的成果经验，对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启示？

王巍：考古学靠新的资料不断丰富和充实，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的一个不经意发掘，有可能改写历史，改写了我们这辈人依据当时考古材料提出的认识，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希望有更多人热爱中国考古事业，并坚持下来。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是探源工程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而把探源工程研究引向深入，必须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径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同时继续

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阐释，特别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参与。还要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国内宣传推广，创新传播形式，增强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此外，还要继续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举办线下线上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展，继续办好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和良渚论坛、太湖论坛、北京文化论坛、尼山东山论坛等，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加大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普及考古

学术家园：您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上谈到，新时代的考古研究，还要投入到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领域。在这方面您有怎样的探索与实践？

王巍：考古人除了研究考古，还要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考古、普及考古，比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物展览、考古研学、考古讲座、出版图书等，让更多人了解考古，了解与研究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今年9月，探源工程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研究成果已经写入初中历史课本。我参与了教材修改，比如增加了万年的稻作、8000年的骨笛、甲骨的刻画以及5000年的良渚等。最近我还出版了两本介绍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通俗读物——《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介绍了不少最新的重要考古发现——桥头遗址8000多年前的彩陶“八卦”符号、双槐树遗址5000年前的“北斗九星”遗迹、南佐遗址5000年前的“九台”和官城宫殿等。我将考古成果结合人们日常生活，深入浅出地解答“人类的起源和

发展”“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等考古学核心问题，从时间线上梳理这些考古成果发展脉络，从文化传承的内涵上厘清分布于中华大地各个地方的考古文化的内在联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刻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学术家园：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巍：放眼世界，距今5000年前后，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地区文明之间的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金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金术在西亚地区是制作小件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在其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利用在此之前已经熟练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容器的技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和铜铃。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就是突出代表。这一事例表明，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明因素并非只是照搬，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其生生不息、永葆活力、延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距今5000年前后，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的栽培技术向西亚地区传播。此时期经由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比汉代张骞通西域早2000多年。还有水稻和丝绸的向外传播，也都远远早于汉代。记述西周穆王游历四方的文献《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到西域的女王国，赠送给该国国王西王母大量丝绸。在古希腊的文献中，可以见到希腊的贵族以拥有一件中国产的丝绸衣物为荣的记载。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对于两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古语有云，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学海星光

传承与发展

像孔子那样当老师

叶美峰



《孔子圣迹图》(局部) 张楷(明代)

响，因此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孔子自己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始终秉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赢得了学生的极大认可。

温故知新，诲人不倦。古往今来的大先生用自己的理想、思想、品德、知识、智慧和行动深刻诠释了大先生之大是学问之大、奉献之大，也是品德之大、胸怀之大。在这当中，首要的就是学问要大。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意思是作为教师，应该始终保持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教学的热情，不断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潜力。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的一生，更是学习的一生。他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70岁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未尝有一天在读书学习上有所松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就是“终身学习”。

孔子不仅勤于学习，更善于学习。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然，这里的“温故”并非简单地回顾过去，而是深

入反思和总结。此外，他不仅重视自身的总结反思，也注重随时随地向他人学习，把身边人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论语》中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如《论语·里仁》篇中，“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述而》篇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博学多才、学问渊博，绝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建立在勤学好学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孔子一生弟子众多，相传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来自齐、鲁、卫等多个国家。年龄跨度极大，年纪最大的子路仅比孔子小9岁，年纪最小的叔仲舍与孔子相差54岁，学生之间资质也不尽相同，但只要学生有求知的渴望，并且品德良好，孔子都十分愿意为他们教授知识。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

因材施教，学以致用。既然“有教无类”，而学生的个体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孔子根据子路和冉有的不同性格特点给予了个性化的教育，使他们避免了“过”与“不及”的毛病。孔子对自己的学生脾气、秉性如数家珍，因此在教授道理的过程中，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意味着只有当学生真正思考和努力寻求答案时，老师才应该给予启发和指导。这种教

学方法鼓励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他还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思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乐以忘忧，热爱生活。《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生活的快乐使他忘记了一切忧愁，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孔子生活中的爱好是非常广泛的。“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的是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觉得乐曲太优美了，长时间陶醉于这首乐曲的美妙旋律和它所创造的意境中，以至于三个月不知肉味。“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孔子射箭的时候，周边争先观看的人多得像一堵墙，可见其技艺高超。孔子不但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也很注重物质生活的质量。孔子注重养生，其表现之一就是注重饮食。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穿衣方面也有考究，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荣光，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教师的日常工作大多数时候是平凡的，甚至是琐碎的，但每一个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教师，都可以像孔子那样，从中发现教育的新鲜、有趣和诗意，在平凡的日子里去创造幸福、发现幸福、体验幸福。

学者笔谭

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人民政协的历史贡献，深刻阐明人民政协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深入阐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人民政协“要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结合国际传播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更充分地宣介阐释人民政协75年发展历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创新安排，宣介阐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涵本质、独特优势和文化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以及中华民族团结同心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重大部署，体现了新时代推动国际传播工作守正创新的战略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等新任务新要求，为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结合履职要求和国际传播工作实践，简要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深刻认识文化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价值，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性做好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传播，其核心是传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发展观念和态度立场，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持久的传播力与深层次的影响力。同时，文化传播形式上又是一种融合传播，涉及大众传播、媒体传播、学术传播等各个领域，具有广阔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潜能。国际传播要自觉增强文化传播意识，坚持思想引领，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重要主题，准确阐释中国倡导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好多元多样的传播路径，推动媒体传播、图书出版、智库研讨、人文交流、文艺文娱等众多领域“百花齐放”，使文化传播更为多彩、更接地气、更富成效。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效能。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引以为豪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只有站在相互尊重、平等互鉴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对外阐释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在价值取向、处世之道、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共通之处，才能更易于被对象国民众理解和认同。在国际传播中，要加快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既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也要讲好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交融互动中共同发展的故事。比如，对外讲好协商民主的故事，就要讲清楚中国式协商民主扎根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体现了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中“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兼容并包”“聚同化异”的思想传统，同时吸收借鉴了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其他国家文明中蕴含着许多相近的政治文明理念，共同体现了人类对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追求。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重要支撑。新时代以来，多主体、立体式的传播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拓展，地方外宣、城市外宣、高校外宣、民间外宣、企业外宣、边境外宣、海外机构外宣等多元外宣渠道都在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维度。从提升传播效能的角度，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有利于各方面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国际传播合力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具有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组织优势、人脉优势，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开展公共外交的职责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加需要将“政协外宣”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民民主故事的优势，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外文局局长)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杜占元